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张宝三 杨儒宾 编

日本汉学研究续探：
思想文化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张宝三 杨儒宾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汉学研究续探： 思想文化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汉学研究续探:思想文化篇/张宝三、杨儒宾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7-5712-3

I. 日… II. ①张…②杨… III. 汉学-研究-日本-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946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日本汉学研究续探:思想文化篇》,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254 号

日本汉学研究续探:思想文化篇

编 者 张宝三 杨儒宾

项目编辑 钟明奇

文字编辑 李善强

责任校对 赖芳斌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712-3/B·360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将近十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两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为“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迄今已出版专著七十余种(仍在陆续出版中),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

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将近十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相信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未来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黃俊傑 謹識

2007 年 4 月 13 日

于台北台湾大学

导 言

杨儒宾*

(一)

《荀子·正名篇》中曾说：“名无固宜”，我们如要了解语言滑头(slippery)的本质，“汉学”这个词语可以提供很好的例证。对当代一般研究人文学科的学者而言，“汉学”指的当是广义的中国学，“汉学研究”指的即是研究中国学的一个学术领域，这是“区域研究”的用法。对老一辈研究国学的华人研究者而言，“汉学”则指的很可能是清代时期与宋学对立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因为在汉代特别兴盛，所以被称作汉学。但对东北亚的日、韩学者而言，“汉学”这个词语的涵意又有所不同，它有可能指的是广义的中国学研究，就像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当代一般理解的区域研究之情况；但它也有可能指的是用汉字书写、源于汉文化、但实际上已在日、韩本土生根的一门学问。

本书所说的“日本汉学研究”即包含上述两种主要的涵意在内，它既可指日本学者对中国学的研究，也可指学者对已在日本本土化的汉文化或具有汉文化精神倾向的学问之研究。这两系的研究在概念上可以分开，实际上却呈现了纠结已甚的复音重唱现象，日本汉学的复音重唱现象在文化研究上是个值得深思的案例。众所共知，日、中两国有长期交流的历史，日本

* 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曾大量输入汉字与汉文化,但也很蓄意的以格义的方式吸纳之。在佛学与儒学领域,我们都可看到这样的现象,甚至日语的训读都可视为大和文化消纳汉文化的一项策略。但海运东来以后,日本却又以汉字为载体,大量的反输入中国新的概念。近代中国输入日本转手加工的新概念与新知识之规模如是之大,如是之深,它所提供的刺激事实上已深入骨髓般地改造了华人的思维习惯与精神倾向。我们今日研究日本汉学,其意义已经不仅是客观的研究异域一门自华夏移植过去的学问,甚至也不仅是透过“他者”的对照以求更深刻的认识自家,而是不可避免地涉身于汉及东西洋相互指涉的多重意义解读的一种行径。

我们其实可以放心地说:不了解广义的日本汉学,在相当的程度内也就没办法了解自己,也无法了解近代东亚史的世界性格。日本汉学不会只是日本的,也不会只是汉学的,它拥有其他学科少见的多重的互文性。台湾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处境,它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更应该了解日本汉学,也更有能力吸纳日本汉学。台湾是汉文化活动颇为旺盛的地区,它有机会整合来自岛屿与大陆的各种汉学资源,并发展出新的论述。四年前,台湾第一次出现以“日本汉学”为名的国际学术会议,^①可以说是对这种认识的体现。会议完后,学界颇有回响,而且在短时期内,同时出版中、日文版的会议论文集,^②这显示“日本汉学”拥有相当值得注意的议题,它是值得进一步开垦的丰饶园地。

(二)

第一届日本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后两年,由台湾大学日文系主办,

① “日本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3月16日及17日,台大中文系、清大中文系及汉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② 张宝三、杨儒宾合编:《日本汉学研究初探》(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2年)。2004年6月后,此书改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日文版见张宝三、杨儒宾主编:《日本汉学研究初探》(东京:勉诚出版社,2002年)。

于2003年11月7日、8日,假台湾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会议。^①次年,又由台湾大学中文系主办,于2004年10月29日在台湾大学举行了第三届日本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②这两次会议的具体成果之一即是包含本书在内的两本论文集。

本论文集共收论文十篇,其中属于经学研究者有三篇,属于孔子研究的文章有两篇,这两篇也可划归为经学研究的范围。其余五篇,一篇属于小学研究,两篇是中日交流的影响研究与比较研究,另外两篇则是对日本重要汉学者的探讨,这两位汉学者归属的汉学恰好分别为我们上述所说的“中国学研究”及“日本本土化的汉学”两种领域。这十篇文章的分配应该是偶然的,但由经学占的比例过半,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日本汉学”这个概念的辖区里面,儒学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日本儒学”与“日本汉学”的概念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张宝三及江口尚纯两位教授研究《诗经》有年,他们分别探讨日本两位重要汉学者的《诗经》研究,可谓本色当行。清原宣贤乃日本所谓“博士”家的儒者,此一家风的研究在日本有一传统,而国人知其义者尚少。清原宣贤著作甚夥,张教授《清原宣贤〈毛诗抄〉研究:以和〈毛诗注疏〉之关系为中心》一文将焦点集中在他的《诗经》学上面。张教授的研究显示日本《诗经》学研究自有其特色,清原宣贤的《毛诗抄》不但有校勘的价值,它保留的旧注解形貌及日人研究方法都有值得参考之处。

大田锦城是江户晚期的汉学大家,其著作数量极为可观,即使放在同一时代的清朝、甚至东亚各国任一时代衡量,其著作之丰都是很显著的。大田锦城的知识领域甚广,但经学当是最核心的学问,经学当中的《诗经》学更是他平生专精所在,其相关著作竟达十五种之多。大田锦城治学很难说有特殊的思想倾向,汉、宋兼治,训诂、义理、考证并重,这大概是他持守的立场,

① 此次会议由台湾大学日文系主办,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台湾大学中文系、中研院文哲所、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等合办。

② 此次会议由台湾大学中文系主办,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台湾大学日文系、中研院文哲所等有关单位协办。

井上哲次郎等人将他的学问列为折衷学派，^①这样的判断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他的著作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恐怕还是在考证学上面，所以，如果“考据”可以独立列目，我们将他列入考证学派，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② 大田锦城的学风在他的《诗经》学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江口尚纯教授《江户时期〈诗经〉研究的动向之一：以大田锦城为主》一文对大田锦城的《诗经》学作了扼要的介绍，文章附录《江户时期〈诗经〉关系书目》可以见出江户一朝《诗经》研究的梗概。

上述张教授及江口教授两篇文章带有较显著的传统经学研究的性格，相对之下，张崑将教授《晚明孝经风潮与中江藤树思想的关系》一文则偏向比较研究或影响研究的范围。《孝经》在十三经中篇幅最小，但它的影响却不比别的经典少。在两汉魏晋一片以孝治天下的时代思潮笼罩下，《孝经》自然水涨船高，成为一代显学。晚明又是《孝经》极受重视的一个时期，大儒黄道周、吕维祺等人皆有《孝经》学专著问世。尤其黄道周在北京因政治因素入狱，以写《孝经》传道化世，其手泽至今犹有存世者，世人争以为宝，此一佚事尤堪传为儒林佳话。中江藤树为日本阳明学之祖，但他在江户儒学史上的另一显著现象则为表彰《孝经》，中国的王学中人自然也不会不重视《孝经》，但此经在王阳明本人的思想体系中几乎不占据任何重要的地位。中、日王学在此点的分殊性表现很值得留意，张君励先生五十年前曾撰文比较中、日阳明学，^③但没有注意到《孝经》的重要性，更不要说此经流传的相关思想史背景了。张崑将教授此文补充了此段空白。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者，他是“汉学”此一概念必然会碰触到的核心人物。大和民族作为异于华夏的异民族，它要吸纳作为外来文化的汉文化时，必然跳脱不开“如何消纳孔子”这一关。庆长五年，公元1600年，藤原惺窝以儒服见德川家康，畅谈治国理念，此事被视为江户儒学史一件划时代的象征性

① 参见《日本伦理汇编》（东京：育成会，1901-1903年），《折衷学派の部·下册》所收大田锦城两本著作《疑问录》及《仁说三书》三卷。

② 林庆彰、连清吉、金培懿合编：《日本儒学研究书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即将大田锦城列入考证学派。

③ 张君励：《比较中日阳明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5年）。

事件。同样重要的象征意义也见于祭祀孔子这件事上。晚近的研究显示德川初期的尊孔崇儒具有浓厚的政治目的,因为在十七世纪时期,日本境内唯一可找到有体系的抗衡新兴的耶教传教势力者,大概只有儒家所代表的整套文化体系。儒门这套体系涵盖教义与实践诸面相,实践面相中即包含对孔子的祭祀。McMullen 教授“The Worship of Confucius in Early Tokugawa Japan”一文对早期德川日本的一大事因缘,作了详细的说明。

儒学自在江户日本生根后,^①孔子在某一个意义之下,也就是本土化的孔子。日本甚至流传一个以往中国较少使用的语汇——孔子教,而且随着“儒教”的公众形象不断受损,孔子教遂有逐渐与儒教分道扬镳的趋势。自从明治时代确立现代新的大学组织以后,我们发现日本汉学有个极大的特色,即是主要的汉学家一生往往有一本关于孔子或《论语》的著作。这种传统至今依然存在。在上世纪后半期,日本学界撰写孔子著作的质与量仍甚可观。中嶋隆藏教授《二十世纪后半日本之孔子研究》一文举出八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一一评述。中嶋教授此文虽然无法完整地笼罩当时的孔子研究,但他的评介可以呈现半个世纪日本汉学的孔子图像,对于从津田左右吉到浅野裕一等人著作的时代背景,此文更作了精简的说明。

池田证寿教授《〈玉篇〉和日本的古字书》一文探讨的是字书的问题,传统上将这种学问称作小学,其内容很难说和本论文集“思想文化篇”的主题直接相关,然而,中国经学和小学原本也有极深的渊源,十三经中即有小学的《尔雅》一经;作《说文解字》的许慎既是伟大的小学家,也是重要的经学家。清代的经学家往往也具备小学的背景,这都是很清楚的事。池田证寿教授此文对勘《玉篇》与日本的古字书,并指出此中土佚书的史料价值,但也警告其价值不宜太过分夸大。池田教授的结论颇有助于此书价值之肯定。日本多保存中土已佚之汉籍,日本汉学界长期以来也多注意到版本的问题。光绪年间,黎庶昌、杨守敬使日,编辑《古逸丛书》,国人渐知海东扶桑多珍贵典籍,池田教授此文再度印证了保存在日本的汉籍资料之价值。

① 当然也有人质疑儒学从来没在日本生根,如津田左右吉即如此主张。这种史观如视为“一家之言”,它有种理路。但它很难将这么清楚的历史现象解释掉。

(三)

十七世纪中叶是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满州地区一个小部族，大明王朝一些义不帝秦的子民纷纷流亡海外，积极或消极抵抗。其中郑成功率领大批军民渡海居台，这是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一支。同一时期，另有些士子与僧侣东渡扶桑，并在彼地开花结果。陈元赟、朱舜水、隐元、独立、心越等人即为其中的佼佼者，朱舜水与隐元影响尤大。

如果朱舜水体现的是朱子学的精神的话，隐元带到江户日本的则是一种新的禅宗风格。禅宗在近世中、日交流史上一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宋、元时期东渡的华僧以及西来的日僧，先后将这株生于印度、长于华夏的思想奇葩移往扶桑，并在彼地展现新的风貌。这股禅学东传的运动历时甚久，隐元传去的临济禅自然不是首次东渡，但隐元所开启的日本黄檗一系，论支脉之广，论对相关文化领域影响之深，应该都是之前的华僧所比不上的。隐元不像之前的华僧多只履（最多加上极少数弟子）东渡，他带到日本的也不只是佛学。隐元东渡是个特殊的形态，他除了带领一批僧侣同行外，也带领了一批艺匠。所以他除了带去禅学外，也带去医学、书法、艺术、建筑、饮食等等知识，学者或认为隐元代表的是集体的文化移民，这个判断是合理的。有关隐元研究的文章虽然已不再陌生，但中文著作中论断面之广、论断之中肯，徐兴庆教授《隐元禅师对德川中期日本文化之影响》此文仍是当中之佼佼者。

伊藤仁斋与戴震分别是江户儒学与清朝儒学的代表人物，这两人之间的思想颇有近似处，中、日许多学者都已见到了。伊藤仁斋是否影响了戴震？或者吴苏原是否影响过伊藤仁斋？就目前所见的资料而言，大概都只能视为聊备一说的揣测。拙作倾向于仁斋与戴震的思想都是独立发生的，独立发生当然不是意味着彼此前无所承，或者说他们可以独立于时代思潮

的影响之外。而是指他们的主导性思想是自己综合各种相关的思想因子后,提出突破当时主流思潮的新说。笔者认为伊藤仁斋与戴震代表的新说是种相互主体性的伦理观念,日文的术语“间柄”似乎更可以表达构成人格的“间主体性”。戴震则用一个更简约的语言“情理”称之,借以显示伦理的情感交通性格。伊藤仁斋与戴震力反程朱理学的超越性,他们的反对固然有知识论的理由,但也有伦理学的要求,笔者认为后者更重要。亦即笔者认为伊藤仁斋与戴震在儒学史上的意义乃是他们所作的主体性的批判,他们将人性从超越的“性即理”拉到“血气心知”的层次立论。

内藤湖南是近世汉学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他记者出身,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很敏锐,国人对他提出的唐宋文明说以及文化发展模式都不会太陌生,事实上,他可以视为“近代中国起于何时”这个问题意识的主要推动者。二十世纪之交是中国各种思想纠结最深的一个年代,内藤湖南身为重要汉学家,又身为现实感极强的中国通,他免不了会深陷“中国情结”里。二次战后,他的一些对华言论自然引起批判,他的学说因而也引起各种不同的解读。随着历史的推移,一些私人性的论点慢慢地退到历史舞台之后,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的洞见又逐渐重现光彩。Fogel(傅佛果)教授是将内藤湖南介绍到英语世界的有力人士,在代表作出版多年后,他重新反省他以前的代表作疏忽的两点: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了解之贡献,以及他对内藤湖南的“中国观”之印象,这两点原本就是其代表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所想解释的议题。经过多年的积淀,他对此有更清澈的认识,Fogel教授此文重新界定内藤湖南史学的意义。

“如何安排理想的政治秩序”一直是儒者关怀的核心议题,传统的儒者大体上怀抱着“天下”的概念,中国居四夷之中,天子以德政教化天下;四夷则以朝贡的形式,和中国维持一种以礼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到了十九世纪,面对新兴的西洋民族国家的冲击,如何改造旧有的国家及国际概念,以应付新的世界秩序,遂成为当时儒者最感迫切的议题。中国的郭嵩焘、梁启超在这点上曾下了工夫,日本儒者从幕末以来,也不断地思考同样的问题。因为中、日儒者面临同样的处境,所以都想打造一个以现代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民

族国家。会泽安作为江户后期水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思考新的日本国家的性格这点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甘怀真教授《日本江户时代儒者的“天下”观念：以会泽安〈新论〉为例》此文是他研究东亚礼仪政治长期计划下的一环，这个议题既具有学术意义，也可能会有现实上的作用。对于坚持主权国家思维方式的人而言，甘教授此一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维的向度。

（四）

“日本汉学”不管是作为日本学分支之一的一门学问，或者作为“中国的中国学研究”，它都有极显著的特色。我们不妨再重复一次前文的主题：日本汉学与中国本土的“汉学”自然有密切的关联，但却又有自己独立的论述脉络。首先，日本汉学一向有依照日本思想风土所作的选择，从儒佛、建筑、诗画的形态上，在在都可以看出和风的特色。另一方面如就历史的发展而论，日本汉学就像日本国势一样，它在历史推移的过程中，比中国更敏感地接触到现代化的问题。现代中国学问的分类或定调，其起源最大的推动力量往往来自日本，而不是中国。它在新旧学风的转换过程中，提供了华人学者一个很好的参照范例。

研究汉学，日本汉学是不可跳过的议题。在第一届日本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演讲中，郑清茂教授曾引已故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话语道：“为了中日关系的改善，对中国也有要求。那就是希望能多了解日本，特别是日本文明的历史。”吉川教授的呼吁极友善、极理所当然，是原本不需要任何人点醒的声音。因为我们只要深入到“日本文学”或“日本汉学”这些语词的表象后面，即可发现到流动在“汉学”底层的是片流动的、黝黑的文化能量，“日本汉学”与“汉学”间的关系是彼此回复的(reverse)，不存在片面的霸权论述的问题。

“汉学”是回复的，因此，原则上说来其指涉是极度暧昧的。本篇导论在古典学的框架下立论，化繁为简，所以仅能作出上面的陈述。如果要谈得更

清楚的话,翻案可能要更彻底,但更彻底的结果则可能使得此一概念更显得暧昧。和辻哲郎在战前的著作中提及日本的民族精神时,曾经说过:“当我们没有特意探触日本精神时,我们自认为知道它为何物。然而一旦这个问题被提及了,就逐渐感到不能确定了。最后,我们发现根本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日本精神)”,^①我们如果把日本人的发言位置改成华人,把“民族精神”改成“汉学”,和辻哲郎这段话完全可以适用,但这种来自概念本身或方法论的反省,应该留待下次的会议继续讨论。^②

① 引自和辻哲郎:《日本精神》,《续日本精神史研究》,参见《和辻哲郎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62年),卷4,页281。括弧的文字为笔者所补充。

② 第四届日本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于2005年5月在台湾大学举行,会议的主题即为:“日本汉学中的研究方法”。

目 录

导 言.....	杨儒宾	1
清原宣贤《毛诗抄》研究:以和《毛诗注疏》之关系为中心	张宝三	1
江户时期《诗经》研究的动向之一:以大田锦城为主	江口尚纯	35
晚明孝经风潮与中江藤树思想的关系.....	张崑将	74
隐元禅师对德川中期日本文化之影响.....	徐兴庆	120
交感的人伦世界之发现:伊藤仁斋与戴震思想合论	杨儒宾	145
日本江户时代儒者的“天下”观念:以会泽安《新论》为例	甘怀真	167
二十世纪后半日本之孔子研究.....	中嶋隆藏	190
《玉篇》和日本的古字书.....	池田证寿	207
The Worship of Confucius in Early Tokugawa Japan	James McMullen	221
Naitō Konan 内藤湖南 and His Historiography 内藤史学: A Reconsideration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Joshua A. Fogel	243
名词索引		264
人名索引		268

清原宣贤《毛诗抄》研究： 以和《毛诗注疏》之关系为中心

张宝三* 著

一、前 言

日本室町时代明经道儒者清原宣贤(1475 - 1550)之《毛诗抄》为其讲说《诗经》之纪录。^①《毛诗》自间接由百济传入日本之后,至迟于日本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所制定之大宝令已规定“大学寮”中须讲授《毛诗》,且将其列为“中经”。^②此后,明经道博士对《毛诗》讲诵不绝,至清原宣贤之时,已历七百余年。其间,讲说《毛诗》所采用之注解,最初以《毛传》、《郑笺》为主,其后又兼用孔颖达之《正义》。有关早期日本儒者讲授《诗经》之资料,今已不多见。至清原宣贤,则有《毛诗抄》传世,其时代虽至中世,然仍可由此书略窥当时及先前日本儒者讲论《诗经》情况之一斑。

有关清原宣贤之事迹及学问,日本学者已颇有论述。^③本文拟以《毛诗

*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① 《诗经》在汉代有今文家之《齐》、《鲁》、《韩》三家《诗》及古文家之《毛诗》,三国以后三家《诗》相继亡佚,今日唯《毛诗》独存。今日所谓《诗经》者,实为《毛诗》之传本。清原宣贤讲说之《诗经》亦即《毛诗》,本文中所言之《诗经》亦同。

② 有关《诗经》传入日本之历史,参考村山吉广:《日本诗经学史》,《第五回东洋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5年)。

③ 兹举其要者,如足利衍述:《镰仓室町时代之儒教》(东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32年);小川环树:《清原宣贤の毛诗抄について》,《文化》,第10卷第11号(1943年11月);绪方惟精:《清原宣贤の经学》,《千叶大学文理学部纪要(文化科学)》,第1卷第2期(1954年);山田英雄:(转下页)

抄》与《毛诗注疏》之关系为重心略作探讨，以析论清原宣贤之讲说对《毛诗注疏》承袭、调整、变革及理解之情形。此外，亦希冀经由本研究，了解《毛诗抄》在东亚《诗经》学史研究上所具之价值。

二、清原宣贤之生平及其《诗经》学渊源

清原宣贤生于文明七年(1475)，原为神道家吉田兼俱之第三子，出为明经道清原宗贤之养子。宣贤除学习清原家之家学外，亦兼习其本家吉田神道之家学。历任主水正、^①大炊头、^②藏人、^③直讲、^④少纳言^⑤等职，大永元年(1521)，叙从三位。次年(1522)任天皇侍从。六年(1526)晋升正三位。享禄二年(1529)出家，法名宗尤。天文十九年(1550)七月十二日，卒于越前一乘谷，享年七十六岁。

清原宣贤之著述极多，举其要者，如关于儒学有《周易抄》、《易启蒙通释抄》、《尚书抄》、《毛诗抄》、《曲礼抄》、《月令抄》、《左传抄》、《古文孝经抄》、《中庸抄》、《大学听尘》、《论语听尘》、《孟子抄》等。此外，又有关于史书、兵法书、辞书、和歌与和文等之著作，以及《神代卷抄》、《职原抄私记》、《贞永式日抄》、《惟清抄》等关于日本古书之讲说纪录。可谓著作等身。^⑥

在《诗经》学之渊源方面，宣贤之前，清原家历代对《诗经》已有所训说，

(接上页)《清原宣賢について》，《国語と国文学》，第35卷第10号(1957年10月)、和岛芳男：《中世の儒学》(东京：吉川弘文馆，1965年)；土井洋一：《毛詩抄について》，《抄物资料集成》(大阪：清文堂出版，1976年)，第7卷；木田章义：《毛詩抄解説》，《毛詩抄》所附(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等皆有论述。

- ① 主水正(もんどのしょう)为主水司之长，隶属宫内省。掌宫中饮水、粥类及冰室之供应等事务。参见小中村清矩：《日本官职制度沿革史》(东京：东学社，1935年)，页21。
- ② 大炊头(おおいかみ)为大炊寮之长，隶属宫内省。掌宫中天皇及诸司白米、杂粮等食料之配给。参同注4，页67。
- ③ 藏人(くろうど)为天皇之近侍，负责宫中传宣、进奏、仪式等有关文书、杂务等事务。
- ④ 直讲(ちようこう)之职乃辅助明经博士、助教等以教授经书，隶属式部省大学寮。
- ⑤ 少纳言(しょうなごん)为太政官之判官，掌小事之奏宣及官印之管理等。
- ⑥ 以上有关清原宣贤生平及著作之叙述，参考注3所揭足利衍述、土井洋一、木田章义诸氏之论著。